

先锋叙事背后的伦理困境：

希拉·沃森《双钩》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Ethical Dilemma behind the Avant-garde Narrative:

An Ethical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f Sheila Watson's

The Double Hook

王 岚 (Wang Lan) 黄 川 (Huang Chuan)

内容摘要：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角度来看，希拉·沃森的小说《双钩》以先锋叙事的手法，隐晦地展现出人物的多重伦理困境：在个人伦理困境层面，主人公詹姆斯不仅犯下与古希腊神话人物俄瑞斯忒斯相似的弑母之罪，还触犯姐弟乱伦、抛妻弃子等伦理禁忌；在集体伦理困境层面，村民们牺牲作为他者的女性土著居民的权益，对詹姆斯的弑母和逃离既往不咎。综合分析加拿大彼时的社会环境以及沃森在族裔问题中表现出的伦理焦虑，可以洞察沃森对当时族裔政策隐而不露的批判，揭示作者以欢乐结局缓解集体伦理困境的时代局限性。在当今的加拿大社会中，小说描述的伦理困境依旧存在，针对土著及少数族裔的种族歧视依然暗流涌动，文学伦理学批评解读为理解加拿大主流社会的族裔态度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参考。

关键词：《双钩》；希拉·沃森；先锋叙事；伦理困境；伦理意识

作者简介：王岚，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国及加拿大文学研究。黄川，文学博士，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加拿大文学研究。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当代加拿大英语小说先锋性研究”【项目批号：2019M651555】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Ethical Dilemma behind the Avant-garde Narrative: An Ethical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f Sheila Watson's *The Double Hook*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avant-garde narrative of Sheila Watson's *The Double Hook* implicitly constructs multiple ethical dilemmas: on the level of personal ethical dilemma, the protagonist James, like Orestes in the Greek mythology, committed matricide, and he also violated such ethical taboos as incest with his sister and abandoning his pregnant wife. On the level of collective ethical dilemma, James's matricide and escape were forgiven by

the villagers at the expense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Other—the indigenous women. Considering the Canadian ethical situation at that time and Watson’s ethical anxiety regarding the condi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Watson’s implicit criticism of the racial policies in Canada, and also reveals her limitation in relieving the collective ethical dilemma through a happy ending. Such ethical dilemma still remains in the present Canadian society, with lingering raci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indigenous people and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This ethical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provides a meaningful and insightful critique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Canadian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mainstream society.

Key words: *The Double Hook*; Sheila Watson; avant-garde narrative; ethical dilemma; ethical consciousness

Authors: **Wang Lan**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Ph. D. supervisor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British and Canadian literature (Email: 02655@shisu.edu.cn); **Huang Chuan**, Ph.D., is Lecturer at PLA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Luoyang 471003, China).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Canadia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Email: applehc@vip.163.com).

在 20 世纪的加拿大文坛中，希拉·沃森（Sheila Watson, 1909-1998）是一位不容忽视的作家。她和加拿大文坛巨擘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都属于学院派作家，但沃森并不多产，仅凭一部长篇小说《双钩》（*The Double Hook*, 1959）就奠定了其文学地位。这本小说写成于 20 世纪五十年代初，被称为“魔幻小说、侦探小说、乌托邦小说、探险故事、英雄文学、浪漫小说和哥特小说的混合体”（Goldman, “Coyote’s Children and the Canadian Gothic” 44）¹，因其碎片化、模糊性和跳跃性等新颖独特的反传统风格一直找不到出版社，直到 1959 年才得以问世。《双钩》以神话故事改写和地方特色描述相结合的先锋叙事，将场景的本土性和地域性与主题的国际性和普遍性进行了完美结合，展现出彼时加拿大文坛少有的现代主义风格，“为加拿大超越地域性、摆脱殖民地意识束缚做出了突出贡献”（Staines 19）。因此，沃森被誉为“加拿大第一位现代主义小说家”（Dvorak 162），其创作理念推动了加拿大文学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的繁荣发展。加拿大先锋派诗人尼科尔（Barrie P. Nichol）宣称正因为被《双钩》“精彩而又神秘的叙事风格所吸引”（Bowering 16），自己才下定决心投身文学创作。

在叙事层面，《双钩》凭借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对经典的挪用，为加拿大文学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但在主题层面，小说丰富的伦理内涵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表面上看，《双钩》是对古希腊作家埃

1 凡未特殊注明，本文引文均出自笔者拙译。

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Oresteia*)及索福克勒斯的《厄勒克特拉》(*Electra*)的改写:与英雄阿伽门农之子俄瑞斯忒斯(Orestes)相仿,主人公詹姆斯·波特(James Potter)杀害了生母波特太太,与姐姐格蕾塔乱伦,抛弃了怀孕的女友林琴后自我放逐,最终幡然醒悟、回归故土,不仅驱散了母亲萦绕在村落的亡灵,还带领村民在严酷环境中谋求生存,成为当地的领袖和英雄。但是,为何詹姆斯触犯多种伦理禁忌却未遭受惩罚?为何村民愿意接受詹姆斯成为部族的首领?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答。在谈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先锋作品时,评论家斯蒂夫·贾尔斯(Steve Giles)指出,有些作品在叙事方式和内容上体现的先锋性,有时是为了“向有辨别能力的读者传递其不便于直接表达的思想”(iv)。《双钩》其实采取的正是这一策略。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看,通过对古希腊悲剧故事的挪用,《双钩》将伦理秩序的意义移植到加拿大社会环境中,以先锋叙事的手法隐晦地展现了人物的多重伦理困境:在个人伦理困境层面,主人公詹姆斯不仅犯下与俄瑞斯忒斯相似的弑母之罪,还触犯姐弟乱伦、抛妻弃子等伦理禁忌;在集体伦理困境层面,村民牺牲作为他者的女性土著居民的权益,对詹姆斯的杀人和逃离既往不咎。综合分析加拿大彼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作者的伦理意识,可以洞察沃森对加拿大族裔政策隐而不露的批判,揭示作者以欢乐结局缓解集体伦理困境的时代局限性。在当今的加拿大社会中,小说描述的伦理困境依旧存在,针对土著及少数族裔的种族歧视依然暗流涌动,文学伦理学批评解读为理解加拿大主流社会的族裔态度提供了较有意义的参考。

一、先锋叙事中的个人伦理困境

透过《双钩》先锋叙事的表层可以发现,小说在故事内容上是对《俄瑞斯忒亚》及《厄勒克特拉》的改写。主人公詹姆斯和俄瑞斯忒斯一样,触犯了多种伦理禁忌,经历了逃离、顿悟和回归,解开了“伦理结”,摆脱了个人伦理困境,获得了自我救赎。《双钩》体现了对文学经典的传承与创新,将伦理秩序的意义置于加拿大的现实语境之中。

《双钩》的故事内容并非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从头道来,而是通过一连串的事件剪辑而成,增加了阅读难度。波特太太在故事开始时就被儿子詹姆斯推下楼梯摔死,但小说省去杀人过程,直接展现死亡的结果:“詹姆斯走开了。老太太掉了下去。在房顶的正下方。在房子的地窖旁。掉进了死亡的阴影里。被詹姆斯的意志推下去。被詹姆斯的手推下去。被詹姆斯的话推下去:今天是我的了。你今天钓不成鱼了”(Watson 11)。作者多以这种短语和短句的混搭快速推进叙事,同时大量使用句号而非逗号和引号,几乎不给读者太多停留思考的时间。在小说中,形象、场景和回音成为叙事线索,情节和人物形象被淡化,彻底打破了读者传统的阅读期待。詹姆斯和姐姐格蕾塔的暧昧关系也隐藏于这种跳跃性叙事之中。格蕾塔在母亲去世后变得焦

躁不安，最终将自己锁在家中，放火烧掉了祖宅。她在自焚前曾有一段内心独白：“她让自己的声音震碎所有他[詹姆斯]对那个女孩的回忆（……）她死得痛苦，这样詹姆斯就能记住她的痛苦。她死得很早，这样詹姆斯就能记住她的好。她的死是一种付出，这样詹姆斯就能时刻想起她”（Watson 85）。至此，格蕾塔与詹姆斯的不伦之恋才彻底显现。詹姆斯抛弃身怀六甲的女友林琴，也是直到林琴在即将生产时哀叹詹姆斯的缺席才让人看出端倪。由于小说采取的先锋叙事，读者需要花费一番功夫才能理清主人公触犯多种伦理禁忌和陷入个人伦理困境的过程。

詹姆斯触犯弑母和乱伦等伦理禁忌，是《双钩》对古希腊神话的创造性改写。在古希腊悲剧中，发动特洛伊战争的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按照神谕将长女伊菲革涅亚献祭给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获胜回国后被怀恨在心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杀害。阿伽门农之子俄瑞斯忒斯卧薪尝胆，最终与姐姐厄勒克特拉联手杀死自己的母亲和她的情人。为父报仇后，俄瑞斯忒斯遭到复仇女神的追杀，逃亡到雅典后接受法庭的裁决。在阿波罗和雅典娜的辩护下，俄瑞斯忒斯最终被判无罪，重获自由。沃森显然把这一神话故事置换到了作品之中，波特太太的亡灵是变相的复仇女神，村民们的一致谅解类似法庭的无罪判决。与俄瑞斯忒斯的姐姐厄勒克特拉相似，格蕾塔对胞弟的爱已超越手足亲情，甚至在母亲被杀后依然袒护着詹姆斯。为摆脱母亲亡灵的困扰，詹姆斯逃亡到附近的小镇；在偷听到他人对自己的评判而顿悟后，他最终回到家乡承担责任与义务。在人物与故事内容被置换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詹姆斯是俄瑞斯忒斯一类的悲剧性人物，因为触犯多种伦理禁忌而遭受人生磨难。

虽然《双钩》中的伦理禁忌和古希腊神话中的情形类似，詹姆斯陷入和摆脱个人伦理困境的过程却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小说的背景是加拿大一处偏僻的村落，连年干旱造成了河水断流、土地贫瘠、粮食歉收。严酷逼仄的自然环境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现实的威胁，还有精神的压抑。因此，村庄中人人自危，人际关系淡漠。由于詹姆斯的母亲波特太太生前性格乖戾，女友林琴是为数不多的同情和理解他的村民；但詹姆斯又在与姐姐的相互依恋中发生了乱伦之情。母亲的影响、家庭的压抑和良心的谴责生成了多重“伦理结”，将詹姆斯置于个人伦理困境之中。聂珍钊在其建构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体系中指出，“伦理结是文学作品结构中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在大多数文学文本中，所有的伦理结几乎都是在伦理混乱中形成的（……）伦理混乱往往表现为理性的缺乏以及对禁忌的漠视或破坏”（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21）。在压抑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中，詹姆斯为了解开“伦理结”而选择杀害生母、逃离家庭、遗弃骨肉，殊不知此举再次生成了新的“伦理结”。触犯伦理法则的詹姆斯虽然未像俄瑞斯忒斯一样遭受追杀和审判，但也开始了自我放逐，逃离到附近城镇躲避母亲亡灵的困扰和

内心的愧疚。当他偷听到一位妓女对他客观公正的评价后，詹姆斯发现自己和故土有着无法割舍的情感维系，开始回心转意、回归家园。此时，一个意外发现帮助了詹姆斯——他在返回途中找到了一处暗泉浇灌的草地，这对等待转机的村民们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阿特伍德曾认为加拿大文学与文化中渗透着一种时刻与生活环境斗争的“生存意识”（Atwood 2）。如何在加拿大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存活，是詹姆斯所在的村落共同体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因此，詹姆斯的发现给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带来了希望，他之前的“伦理结”也在村民的接受与原谅中得以消解。詹姆斯对家乡的眷恋转化了他性格中偏激的一面，使他重新振作，以爱心和同情心承担起家庭和村庄的责任，逐渐走出了个人伦理困境。

二、父系社会中的集体伦理困境

与经过法庭审判被宣告无罪的俄瑞斯忒斯不同，詹姆斯给村庄带来重生的希望后才解开了“伦理结”，走出了个人伦理困境。但村民们在面对浪子回头的詹姆斯时，也陷入了集体伦理困境，因为如果惩罚詹姆斯整个村落就会群龙无首、走向消亡，而如果接纳詹姆斯则又等于忽视其触犯杀母和乱伦等伦理禁忌的行为。这种两难处境涉及到伦理义务与责任，最后村民们做出了将集体发展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伦理选择，非但不同情波特太太和格蕾塔的遭遇，还将具有印第安土著血统的母女两人神秘化和他者化。从村民们对待波特太太和格蕾塔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们摆脱集体伦理困境的过程，实际上反映了在父系社会与母系社会的权力斗争中男性对女性的迫害与压制。

波特太太和女儿格蕾塔显然是村民眼中的“他者”。波特太太在故事刚开始时已经过世，她的形象主要是通过他人的眼光来认识和形塑的。波特太太生前被人视为“专制的暴君”，她四处入侵别人的领地，随意在村民们的鱼塘钓鱼——“她的渔线远远越过自家水域，落入邻居最好的池塘”（Watson 15）。死后，波特太太被妖魔化。村民们总认为她的鬼魂还徘徊在村落之中。波特太太的死似乎只是她对人们监控与压迫的开始。波特太太被视为一种哥特式的邪恶力量，将整个村落笼罩在恐惧之中，她在村落中的存在似乎更多地是“让这个小小社会分崩离析”（陈艳华 4）。同样，格蕾塔也被认为“和她母亲一样性格急躁、感情用事”（Watson 59）。当感情受挫的格蕾塔以自焚来躲避他人审视的目光和疑问时，没有人理解或同情她的境遇。格蕾塔悲愤地将自己比喻成扑火的飞蛾，而本该劝阻格蕾塔的邻居安吉尔却质疑格蕾塔对他人的情感：“你从来就不会感到火焰烧着了你的翅膀，你从来没有任何感受”（Watson 73）。格蕾塔哥哥威廉也训斥道，“做个好女孩吧，格蕾塔，我们在尽力帮你”（Watson 73）。可见，性格怪癖的母女二人都不符合村民们对传统女性角色的期待和要求，是受到集体排挤的边缘人物。

波特太太和格蕾塔的原著身份则是两人被神秘化和他者化的主要原因。

在这个偏远逼仄的村落中，族裔意识从未缺席——村民们“没有人知道波特太太的出身”，却认为“她肯定有着土著人的血统，因为她的孩子威廉和詹姆斯（还有格蕾塔）都是混血儿”（Watson 61）。可见，村落中人数占优势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早已同波特太太一家划清了界限。他们还将波特太太和格蕾塔同神秘莫测的土著神明“野狼”（Coyote）联系在一起。在印第安神话中，野狼相当于《圣经》中的耶和華，以半人半兽的形象出现，有着呼风唤雨、掌控人类命运的能力。¹当波特太太的亡灵出现和格蕾塔放火自焚时，野狼的嚎叫声就充斥在村落不远处的山谷之中，这让没见过野狼的村民们心生恐慌和焦虑。因此，村民们纷纷认为波特太太“总是与野狼凄凉的声音有关联”（Watson 43）；邻居们也能感到格蕾塔死后的存在——“艾拉害怕会再次看到格蕾塔恢复肉身，站在她造成的废墟之上”（Watson 112）。波特太太和格蕾塔原本就因为强势的个性而招致众人的不满，其有别于他人的族裔身份更是加深了村民们的偏见，被逐渐想象成哥特式的神秘形象，这也为后来村民们忽视詹姆斯弑母和乱伦的行为埋下了伏笔。

两位女性的死亡都直接或间接由詹姆斯造成，对于这样一个“杀人犯”，村民们像迎接英雄一样接纳他，也是他们陷入集体伦理困境后做出的抉择，体现出父系社会对女性他者的迫害与压制。在古希腊神话中，杀害生母的俄瑞斯忒斯受到复仇女神的追杀，因为弑母是母系社会时代绝对不能容忍的大罪；复仇女神正是母权时代法律体系的代表。然而，代表父系社会的阿波罗和雅典娜却在法庭审判中宣称俄瑞斯忒斯弑母是为父报仇，父权原则高于母权原则，所以他最终无罪获释。这种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的冲突在小说中也有明显体现。波特太太和女儿格蕾塔是母系社会的代表人物，前者喜欢随意进出邻居的领地，有着极强的占有欲；后者则无视众人对她的角色期待，反对认同村落中的男性价值观。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两位女性都触犯了父权社会中的伦理禁忌。正如聂珍钊在谈及伦理禁忌时指出，“文学作品在描写伦理禁忌的同时，人的自由本能和原始欲望也得到真实的充分的描写”（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9）。这两位女性本来就被排斥为他者，加之她们的欲望得不到周围人群的认可，最终在与詹姆斯等人代表的父系社会的斗争中败下阵来。虽然接受触犯伦理禁忌的詹姆斯使得村民们陷入集体伦理困境，但通过将波特太太和格蕾塔塑造成神秘的他者，村民们缓解了原谅詹姆斯带来的伦理压力，心照不宣地构建起一个忽视两位女性命运的共同体。沃森的传记作者弗雷德·弗拉伊夫（Fred T. Flahiff）指出，“这部小说游离于伦理道德法治之外（……）展示的是一个公众通过默认和共谋进行管理的世界”（323）。因此，波特太太和格蕾塔这两位印第安女性人物成为詹姆斯个人成长和村庄集体生存的牺牲品。虽然村民们做出的伦理选择带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集体伦理困境，但男性霸权和种族压迫的麻痹作用缓

1 See Leslie Monkman, “Coyote as Trickster in *The Double Hook*.” *Canadian Literature* 52 (1972): 71.

解了他们的心理压力，整个村落的伦理秩序最终得以重构。

三、沃森的伦理意识与时代局限性

小说《双钩》以欢乐结局收尾——浪子回归实现自我救赎，破败村落迎来发展生机，但两位女性人物的牺牲和村民们陷入的伦理困境却传递了隐藏于这一结局背后的忧虑。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看，沃森表现了对加拿大土著居民的关注，反映了小说旨在传达的男权伦理意识，提醒读者如何去审视和对待“他者”。但沃森似乎又有意采取先锋文学形式将他者的形象神秘化，进而模糊了对白人社会的批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作者囿于彼时加拿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当今加拿大主流社会依然存在针对少数族裔的种族偏见与歧视，正是这种伦理困境的延续。

作者沃森之所以关注加拿大土著居民的文化传统和生存环境，和她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在创作《双钩》之前，沃森曾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一个偏僻乡村当小学老师。该地区曾一直是苏士瓦（Shuswap）印第安人的生活居住地，近两百年来他们一直在与加拿大政府争夺这片土地的归属权。这些土著人“并没有签署协议放弃自己的领地，也没有与白人交战或是被白人征服（……）但是政府的土地法规却强加到他们身上，而且没有任何补偿”（Balf 13）。因此，虽然来自英美等国的移民都和当地土著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之间仍旧存在着不理解、不信任甚至是反感的情绪。波特太太和格蕾塔身上带有的独特性和神秘性，正反映出白人社会看待印第安土著及其文化的方式。

在与印第安人相处的两年中，沃森对土著文化传统有了更深的了解，体会到了这片贫瘠荒芜的土地带来的孤独和寂寞，也开始对印第安居民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产生同情，为加拿大政府对待苏士瓦印第安人的方式感到羞愧。沃森曾提及之所以创作《双钩》，是因为这么一个支离破碎、与世隔绝的社区让她震惊不已。在给好友艾米丽·卡尔（Emily Carr）的信中，她提道：“对于这些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土生土长的人，我们知之甚少，而太多的东西都已丢失了。我觉得有必要为他们做些事情”（Goldman, “Ethics, Spectres, and Formalism in Sheila Watson’s *The Double Hook*” 195）。她认为“那儿的土著学生寄宿学校就像是一个孩子们的监禁地（……）尽管他们的语言以及宗教和社会文化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已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Walbohm 84）。据统计，自1870年第一所土著学生寄宿学校设立，到1996年最后一所关闭，共有超过15万原住民儿童被强迫送入这些学校学习。¹在这些寄宿学校，他们不能讲民族语言，不能保留本民族的宗教与习惯，只能说英语或法语，言行需要符合白人社会的文明规范。由于白人优越论思想的作祟，寄宿学校对

¹ See Darion Boyington and John A. Roberts, *Indigenous Peoples in Canada* (Toronto: Emond Publishing, 2017)135.

这些原住民子弟采取了诸多粗暴手段，敢于抵制其文化洗脑的孩子会遭到各种各样的体罚和虐待。因此，《双钩》对女性人物的哥特式描写是有其用意的。波特太太和格蕾塔始终不被村民们所接受和理解，反映出加拿大主流社会对土著居民所持的既好奇又压制的心态。小说中萦绕不去的幽灵则是土著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见证，代表着土著人悬而未决的领土主权要求和平等权利诉求。在此，沃森希望印第安土著能够获得其他人、尤其是加拿大白人社会的理解和接受。

然而，虽然沃森亲眼目睹了印第安土著人在加拿大的生存现状，她对土著人的同情和关注并非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表达出来。小说以极简的语言和事件剪辑的先锋叙事来推进故事发展，对古希腊神话进行了具有伦理意义的改写，凸显充满矛盾、神秘和暴力的场景与意象，情节和人物反而成为陪衬，打破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 Stanford Friedman）在谈及小说叙事时指出，如果把叙事的动机定位在自我与他者的跨文化交往，对文本的解读策略就要从以欲望为中心、以时间为线索的范式，转向一个以空间为导向的框架——“相比之下，空间模式将人物放置于场景内定义，在铭刻于空间结构的文化定位内或通过这种文化定位来描述人物。人物的成长或发展与其说是欲望嬉戏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文化互动与定位变化的结果”（195）。《双钩》中先锋叙事将古希腊神话进行空间移植性的改写，也是一种在文化碰撞中凸显自我与定位他者身份的尝试。但在这个文本中，这种尝试显然以失败告终，因为他者依然处于被神秘化的境地。小说场景的碎片化和模糊化使得他者的形象也模糊难辨，儿子弑母、姐弟乱伦的伦理禁忌并未给读者带来太多惊悚突兀之感，削弱了作品传达的伦理道德批判。

实际上，作品的这种处理手段与当时加拿大的社会环境有一定关系。二战后十余年是加拿大迅猛发展的时期，1950年加拿大制造业产值位居全球第七位，物质生活水平仅次于美国（逢珍 112）。到20世纪中叶，加拿大不仅已完全实现了工业化，而且崛起为发达的工业化强国。加拿大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有了显著提高，这极大鼓舞了民众的国家意识，提升了国家自豪感，民族团结一致也成为加拿大亟需建立的国家形象。沃森自己也曾指出，“如果人们对宗教、国家或部落的团结没有任何概念，如果他们没有建立一致的行为模式，他们只能以暴力或冷漠来对待生活”（Morris 55）。因此，尽管沃森同情印第安土著的境遇，但为了彼时国家形象的需要，她还是将作品的主题归总为和谐共同体的建构与生存；触犯伦理禁忌的詹姆斯没有遭到法律的惩罚，反而在为村民找到生存的出路后成为英雄人物。为了能够战胜自然界的压力，村民们漠视印第安女性人物受到的迫害，反映出加拿大主流意识形态对少数族裔和女性的暴力一面。这种行为不仅与传统的人文主义价值观相抵触，也将包括作者在内的白人群体置于一种至今尚未得到有效化解的集体伦理困境之中。在当今加拿大社会，大部分土著居民仍然居住在远离白人

社区的保留地，因贫困导致的暴力、犯罪和吸毒等现象也时有报道。2016年在安大略省和马尼托巴省的一些地区，甚至发生多起原住民因生活举步维艰而自杀和自杀未遂的事件。其他加拿大少数族裔群体也频频遭遇工作和生活上的歧视，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更是有不少华裔遭受无端指责和不公正待遇。以上事件反映出加拿大少数族裔的他者形象并未发生质的改变，加拿大主流社会尽管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在处理族裔问题时仍旧处于诋毁和压制他者的伦理困境之中。

由此可见，尽管《双钩》蕴含了作者反思族裔问题的伦理意识，但社会意识形态的约束减弱了小说的批判性。“伦理价值是文学最基本的价值，体现为一种对他人道德情感上的关注”（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13）。在描写加拿大白人社会与土著居民之间的矛盾时，《双钩》的确展现出了一定的伦理价值。然而，小说中的波特太太处于完全失语的状态，格蕾塔自焚前的呐喊也没有被旁人所理解，“他者”的权利最终没有得到有效保障。究其原因，沃森的叙事并没有尽力展现印第安土著的“独特性”，而是将“不可见性”和“神秘性”作为他者的特点来描绘加拿大的土著居民及其文化，以此为由来维护加拿大国家形象构建的正当性。这种时代局限性是作品的遗憾所在，也是当代加拿大社会依然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结语

《双钩》的先锋叙事和神话改写，造就了其与众不同的现代主义风格，推动了加拿大文学的传承和创新。小说不仅在创作形式上对加拿大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古希腊神话的互文与改写也将其中的伦理意义置于更加现实的语境之中。主人公詹姆斯不仅面临自然环境的考验，还受到家庭情感的困扰，在弑母、乱伦、抛弃怀有身孕的女友后，他陷入了个人伦理困境。通过自我放逐和回归赎罪的方式，他解开了伦理结，还为家乡重获新生带来了转机 and 希望。渴望指引的村民们虽然因接受詹姆斯而陷入集体伦理困境，但为了共同体的生存延续，他们忽视了两位少数族裔女性人物的命运，开始团结一心组建新的家园。沃森在小说中委婉表达了对女性和族裔他者的关切，但在其所处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作品中的伦理道德批判有所减弱。通过这部小说，读者可以洞悉人物所处的伦理困境和作者的伦理焦虑，认识到虽然加拿大政府努力倡导多元文化价值观，但白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看待少数族裔的视角仍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对主流社会审视他者的做法进行合理的伦理批判。

Works Cited

- Atwood, Margaret. *Survival: 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 Toronto: Anansi, 1972.
- Balf, Mary. *The Dispossessed: Interior Indians in the 1800s*. Kamloops: Kamloops Museum, 1978.
- Bowering, George. *Sheila Watson and The Double Hook*. Ottawa: Golden Dog Press, 1985.
- 陈艳华: “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永远的希拉·沃森”, 《外国文学》5 (2006): 3-8。
[Chen Yanhua. “Between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Everlasting Sheila Watson.” *Foreign Literature* 5 (2006): 3-8.]
- Dvorak, Marta. “Ficti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anadian Literature*. Ed. Eva Marie Kroller.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04. 155-176.
- 逢珍: 《加拿大英语文学发展史》。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年。
[Feng Zhen. *A History of 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0.]
- Flahiff, Fred T. *Always Someone to Kill The Doves: A Life of Sheila Watson*. Vancouver: NeWest Press, 2005.
- Giles, Steve. *Theorizing Modernism: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3.
- Goldman, Marlene. “Coyote’s Children and the Canadian Gothic: Sheila Watson’s *The Double Hook* and Gail Anderson-Dargatz’s *The Cure for Death by Lightning*.” *DisPossession: Haunting in Canadian Fiction*. Ed. Marlene Goldman. Montreal: McGill-Queen’s UP, 2012. 39-62.
- 。 “Ethics, Spectres, and Formalism in Sheila Watson’s *The Double Hook*.” *ESC: English Studies in Canada* 33 (2007): 189-208.
- Morriss, Margaret. “‘No Short Cuts’: The Evolution of *The Double Hook*.” *Canadian Literature* 175 (2002): 54-71.
-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 《外国文学研究》1 (2010): 12-22。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
- 。 “文学伦理学批评: 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 《外国文学研究》4 (2014): 8-13。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n Fundamental Function and Core Value of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2014): 8-13.]
- Staines, David. *Beyond the Provinces*. Toronto: U of Toronto P, 1995.
- 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 《图绘: 女性主义与文化交往地理学》, 刘东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年。
[Susan, Stanford Friedman. *Mappings: Feminism and the Cultural Geographies of Encounter*. Trans. Liu Do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14.]
- Walbohm, Samara. “Representation of the ‘Native Condition’ in Watson’s *The Double Hook* and *Deep Hollow Creek*.” *Adjacencies: Minority Writing in Canada*. Eds. Domenic Beneventi, Licia Canton and Lianne Moyes. Toronto: Guernica Editions, 2004. 80-102.
- Watson, Sheila. *The Double Hook*. Toronto: McClelland, 1959.